

文学 和 语言

广义修辞学的学术空间

谭学纯 著



上海三联书店

文学 和 语言

广义修辞学的学术空间

谭学纯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和语言:广义修辞学的学术空间/谭学纯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8. 10

ISBN 978-7-5426-2923-4

I. 文… II. 谭… III. 修辞学 IV. H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56987 号

文学和语言:广义修辞学的学术空间

著 者 / 谭学纯

责任编辑 / 彭毅文

装帧设计 / 熊小凡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http://www.sanlianc.com>

E-mail: shsanlian@yahoo.com.cn

印 刷 / 上海肖华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1240 1/32

字 数 / 310 千字

印 张 / 10.75

ISBN 978-7-5426-2923-4/I·407

定价:24.00 元

自序

30年前,中国高考制度恢复,对经历了高考长期停牌的一代人来说,相当于人类学家所说的“过关仪式”。11年积压的人才资源,怀着激情、怀着期待,从知识饥渴中走向命运的拐点。从这一天起,知识的尊严重新受到尊重。它所解放的,不仅仅是知识,而是尊重知识背后的价值信条,尊重教育公平的自然权力。

作为1977年高考兵团570万群体中的一员,我以六八届初中毕业生的暗淡身份,从一家日杂小店走进久违了的考试秩序。我不曾想到,那场考试是告别、也是开始。此后的学术浸染和学术漂流,孕育了一串属于我的文字,连同眼前这本小书。

书中所辑不同时期发表的学术文本,有早期的稚拙文字,也有比较晚近的阅读偶记。主体内容分上下两篇:上篇为原载《文艺研究》、《文艺理论研究》等刊的一组文章;下篇为原载《语言文字应用》、《语言教学与研究》等刊的一组文章,它们从文学和语言的不同维度聚焦广义修辞学视野。文章刊发时,有的有删节,结集出版时恢复原貌。考虑本书体例的相对统一,编排方面做了一些技术处理。

80年代中后期刊于《文艺研究》和《文艺理论研究》的两篇文章:《语言情绪:小说艺术世界的一个层面》、《新时期小说语言变异的功能拓展》,是和我早期的学术搭档唐跃先生合写的。收入本书,包含着一种纪念和自我审视意向,也包含着我对中国学术体制的思考。

从前一种意义上说,国内学术界在语言转向背景下强势启动的文学语言研究,有我和我的合作者较早的参与,那是我们对文学语言问题系列思考的起点。时过20多年,那种思想之舞和话语欲望的释放,仍是难以忘却的学术记忆。合作因工作原因没能延续,但合作研究的课题在我的话语空间延伸着。2003年起,文学语言学作为我所在博士学位授权点的一个主要研究方向,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2006年,我在《文艺研究》发表《再思考:语言转向背景下的中国文学语言研究》时,仍有着我对国内文学语言研究状况持续的关注。聊以自慰的是,从早期的参与到近期的再思考,我和我的合作者的介入,没有淹没在这些年来同类课题的研究中。

从后一种意义上说,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我和唐跃先后在几十家刊物发表文学语言研究系列论文时,适逢新时期学术牛市。那时候,学术研究在精神贵族和精神小资之间游走,没有或较少今天这样改变生存状态的现世功能。当时我初为助教、后为讲师。像很多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读书人一样,我们没有申请任何科研资助,哪怕是一张稿纸。直到1997年,我甚至没有参加过一次学术会议。这没有影响我们的学术热情、学术产出、以及进入当时或至今我们仍素不相识的研究者的学术史的书写。

如今,昔日的学术风景悄然褪色。学术体制套牢的诗魂和过客,一并在高速公路上失去了生命的从容。学术不可承受之重的一个软肋,是学术评价偏离了符合学术面貌本身的价值中枢:从欣赏研究者的学术品质、学术气魄、学术智慧,转向认同集体的学术平台和研究者个人对集体平台的依托。

我不是说集体平台不重要,而是觉得我们的学术体制在重视平台的时候,忽视了一个更重要的前提:有没有集体平台?有什么层次的平台?什么时候拥有平台?这一切,不取决于纯净的学术关怀,而取决于很多学术外因素。一旦学术关怀在学术体制的运作中改变了学术坐标,它所积聚的能量,又会反过来成为学术人和

学术机构的巨大压力。如此恶性循环,偏离学术生产的初衷,南辕北辙地导向学术评价的价值扭曲。

学术研究,本质上是个人的生命承担、个人的思想喷发、个人对学术界公共规则的信守。汇聚个人学术能量的团队冲锋,是个人创造力的总和。在这个意义上,学术评价体系衡量一个学者的学术成果,是否应该注意研究者个人禀赋之外的综合因素如何成为学术评价的附加值?例如:一个学者依托某个平台的可能性如何?依托某一个平台获得的优越于别人的科研条件如何?拥有平台和没有平台的个体研究者享受公共资源的自然权利是否平等?拥有平台及政府资助与没有平台及政府资助的科研个体、科研产出分别是什么样的比例关系?他们的科研产出中,由本学科看好的标志性成果有多少?由本学科辐射到相关学科的学术成果显示度有多少?用于成果研究的公共资源消耗量和个人成果影响力是什么样的比例关系?等等,这些都是被学术成果掩盖着的隐形因素。如果只看成果本身,不考虑这些隐形因素,我们的学术评价,很难实现学术公正和价值公正。而学术公正和价值公正,是构建和谐学术生态环境、控制日渐社会化的学术浮躁和学术注水的良性配方。

本书附录,可为正文的补充:

附录1是为同类学术成果写的序言和本人同类成果的序言,这些文字中有广义修辞学的不同看点和尚待开发的领地。

附录2辑录《光明日报》所刊一组读书札记,就近年阅读中相遇的文学问题或语言问题“接着说”,长话短说链接正文的长篇论析。共同的写作期待是:希望多一分自己的语言出场,少一分我性的思想缺席。

附录3所辑作者部分学术著作和几组系列论文目录,也许大致可以体现我的广义修辞观形成的前期积累,以及在这个基础上的逻辑梳理和学术提炼。

作者 2007 年岁末记于福州

目 录

自 序 / 1

上篇 文学语言、文学现象、文学史的广义修辞学阐释

再思考:语言转向背景下的中国文学语言研究 / 3

作为对 20 世纪中国文学状态的一种调整,语言转向在一定程度上重建了文学语言研究格局。它在中国文化语境中有些晚到的“语言热”中全面启动,后续的研究势头时强时弱,但一直没有止息。经过了 20 年的理论沉淀和实践操作,重返当年的学术背景,对语言转向拉动的文学语言研究进行再思考,既有利于清醒地审视过去,也利于在再出发的进程中找准自己的位置。

语言情绪:小说艺术世界的一个层面 / 18

小说创作首先起于创作主体的情感冲动,并随之形成小说家心中的幻象世界。为了表现这一世界,存在于创作主体深层心理的主观情绪必须借助一定的物态形式,使之表象化和客观化。艺术作品由此获得了一种符号集成的性质。由于创作主体的主观介入,我们需要在双重意义上看待小说语言:一种意义着眼于小说语言的概念功能,指的是小说家在语言系统中选择相应符号,指称特定的客观对象,并把它编码成艺术作品;另一种意义着眼于小说语言的情感功能,指的是小说家依靠语言符号表述思想的同时,伴随着主观情绪的宣泄。作为前者,小说语言是一种实体符号;作为后者,小说语言是一种审美符号。语言情绪,产生于小说语言的后一种功能。

新时期小说语言变异的功能拓展 / 41

小说语言的基本功能是传递艺术信息，而艺术信息的传递是施动者和受动者互为对象的协作过程。承载艺术信息的小说语言，是小说艺术实现的必要条件。小说语言的功能实现在文本内部体现为叙述交际的圆满完成、在文本外部体现为写读交际的圆满完成。这正好提供了一个观察点。由此切入，可以把新时期小说语言变异的功能价值测定为：叙述者——叙述接受者功能拓展和作者——读者功能拓展的双层建构。

回眸历史风景：文革文学话语论 / 56

“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奇妙的组合体：无政府的表象和绝对的权力意志、浪漫的政治构想和现实的政治运作、怀疑一切和偶像崇拜、开放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和封杀的言说空间，合成了当代中国人需要认真反思的一段历史，文学是这历史档案中一份重要的证词。以理性眼光审视当代中国人非理性生存和类宗教迷狂的文学样本，研究文革文学的话语形态、解读“沉沦”中的“此在”留下的话语记录、考察文学断代史如何采用非文学形式完成自我叙述，在本质上都是品评文革期间人的生存状态。从文革岁月中走过来的一代人，回眸颓败的历史风景，既是“风景”中人，又站在“风景”之外，本文写作即取这种双重立场。

公开的合唱和地下的变奏：再论文革文学话语 / 83

文革公开文本产生的非文学接受，没有泯灭文学主体的话语欲望和阅读期待，相反，后者转换了文学传播与接受通道，引发了相对于文革文学公开合唱的地下变奏。是否可以这样认为：文革公开文本在政治合唱中控制话语权，地下言说试图通过一种相对于公开言说的变奏来护卫话语权。于是，公开的合唱和地下的变奏，合成了文革文学在共时意义上的特殊景观。

一个同源假说及其验证

——民间俗语“郎才女貌”和民间故事“难题求婚”的深层结构 / 105

在分析“难题求婚”和“郎才女貌”由表象转化为表述的过程中，可以观察到一个同源相似的深层结构。“难题求婚”作为一个文化母题，讲述着一个不

断重复的故事：它以“难题”为手段，验证求婚的“郎”有无赢得“女貌”的能力。男子以“才”实现自身价值，女子以“貌”作为进入男性世界的资本，这在漫长的历史文化过程中沉积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才”和“貌”，因此成为传统社会对不同性别者的价值评判和文化限定，并以相当稳定的群体思维，借助民间俗语“郎才女貌”凝固下来。当我们追问“才”、“貌”为什么会被视为男女结合的理想前提和传统的择偶标准时，都可以从“难题求婚”母题见到胎记。

百年回首：一个诗学口号的修辞学批评 / 120

一个诗学口号有悖学理的预设，由相关的诗学理论推动着，在近百年中国文学史进程中，有效地控制着白话诗从表达到接受的双向运作，它的负面影响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才开始得到理论界认真的反思。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诗界革命”的标志性口号，黄遵宪倡导的“我手写吾口”，隐藏着预设的多重理论疏漏：(1) 口语 = 白话/日常话语，(2) 出自“吾口”的白话/日常话语，可以直接转换为“我手”写出的白话诗，(3) 白话诗的可接受性大于文言诗，(4) 诗学建构中话语形态的“文白”之争 = 意识形态建构的“新旧之争”。对这个诗学口号的修辞学批评，在修辞学和诗学的双重话语空间穿行。

下篇 语言教育、语言生活、语言运用的广义修辞学考察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语言教育对策和话语权 / 149

全球化使中国面临的经济挑战、技术挑战、文化挑战，伴随着语言挑战。挑战召唤着应战，全球对话要求我们适时调整语言教育对策。文章提出基于国家发展战略的语言教育、基于言语运用实践的语言教育、基于双轨认知途径的语言教育，同时关注链接地球村的语言，即以一套什么样的话语承载国际认同的公共概念。强调通过国际公共概念的话语输出，让中国化的话语进入全球化的交际平台，从而使汉语的国际化传播具有话语权意义。

语言教育：概念认知和修辞认知 / 162

概念认知在普遍的意义上理性地接近认知对象，修辞认知在局部的意义

文学和语言：广义修辞学的学术空间

上激活主体的新鲜感觉，重新接近认知对象。前者概念化地锁定对象，后者审美化地展开对象。后者的局部认知，往往偏离前者普遍认知的通道，在另一个认知维度观察对象。这决定了修辞认知的两面性：一方面发现概念认知没有赋予的意义，另一方面遮蔽概念认知已经赋予的意义。修辞认知以审美的权力颠覆现成语义的权威，重返被现成概念屏蔽的诗意。人是语言的动物，更是修辞的动物。人对世界的认知，是修辞化优于概念化的。但这却是我们的语言教育理念应该面对而没有面对的事实。

人是语言的动物，更是修辞的动物 / 174

从修辞哲学的角度说，人类以自己的语言系统承载主体经验时，往往已经按照修辞的方式组织为相应的结构模式。现实借助语言而存在，现实是语言指向的存在。因此，人对世界的体验不能不受他的语言模式的制约，不能不经过他的语言过滤。人按照自己的语言方式来分割主体眼中的世界，他的语言方式不是机械化的、数学化的，而是修辞化的；不是僵死的，而是灵动的。人们通过语言来构筑或者接近现实的时候，不断借助修辞手段，修辞每每成为主体抵达认识彼岸的舟筏。

修辞话语建构双重运作：陌生化和熟知化 / 184

修辞话语建构是两个认知系统中的双重运作：通过修辞认知，“变熟悉为陌生”；通过概念认知，“变陌生为熟悉”。前者进入修辞配价关系，以审美自由敞开话语主体的感觉系统；后者进入语法配价关系，以有限的认知模式解读无限丰富的世界。修辞话语建构的双轨运作不能采取相反的路向。语法配价/修辞配价、概念认知/修辞认知、陌生化/熟知化的关系，可以归结为：语法配价因其规范性而产生熟知化经验、拒绝陌生化的感觉。修辞配价因其对规范的有限超越而偏离熟知化经验，制造陌生化的感觉，并在审美层面实现。语法配价所维系的概念认知关系，在逻辑层面实现，在共时的意义上，不因为进入修辞配价而改变。在历时的意义上，修辞配价所对应的修辞认知关系，可以转化为语法配价关系，这涉及语法规范和修辞规则的互转问题。

修辞话语建构：自觉和不自觉 / 197

既定的修辞理论对修辞的定义，预设了修辞只能是自觉的行为，这在理

论上不严密,在实践上更容易出问题。符合语言事实的说法应该是:修辞话语建构包括自觉行为和不自觉行为,同时存在不自觉和自觉的分离、交叉和转化的复杂形态。

语用环境:语义变异和认知主体的信息处理模式 / 208

认知主体经常处理的语义信息包括:自然语言的固定语词义和偏离自然语义的临时修辞义。前者通过词典释义,凝固认知主体的公共经验,作用于人的概念认知;后者通过语用环境中语义的修辞化变异,体现认知主体的个人经验,作用于人的修辞认知。概念认知和修辞认知在言语表达 $\longleftrightarrow$ 言语接受过程中体现出认知主体的六种信息处理模式。影响认知主体信息处理模式的诸多因素中,修辞认知的解释力目前没有引起学界足够的关注。这一研究领域需要更多的学术智慧,有待于广大语言工作者的建设性参与。

仿拟和戏拟:形式、意义、认知 / 222

外语界、汉语界和文学界对仿拟和戏拟两个概念的使用和理解,存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混乱。这两个概念应该区分、也不难区分:仿拟置换本体给定形式的部分构成元素,依托本体的意义;戏拟依托本体的形式,解构本体的意义。仿拟对空符号的接纳,可能是封闭性的,也可能是开放性的;戏拟永远是开放性的召唤结构。模仿性和颠覆性分别是仿拟和戏拟的本质,由此决定了仿拟和戏拟不同的认知难度。

数字“三”/“五”崇拜的发生、演进及相关阐释 / 239

“三”和“五”,是中国人心目中最重要的两个数字,它们由最初的神灵符号,演化为祥瑞符号,终至广泛地进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从古到今,“三”“五”崇拜几乎渗透到华夏文明的各个方面,在神话、祭礼、占卜、术数、宗教、民族、伦理、礼仪、刑律、典章、官职、舆地、教育、军事、医药、艺术、饮食、服饰、婚丧等诸多领域,我们不断见到用“三 X 五 X”模式对相关物象、事象、心象所进行的数的归并和概括。它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中国古人认知世界的方式,及其据以解释自身和宇宙万物的经验系统——这是一个奇妙而有序的世界。

文学和语言：广义修辞学的学术空间

左、右/东、西：尊卑意识及其文化蕴含 / 248

作为个体存在形式，“左席为尊”、“右位为尊”、“东向为尊”、“西者为上”，这些表述都合理，但是当它放到一起的时候，似乎又互相“消解”、互相“颠覆”。实际上，它们因受着不同的观念支撑，而在一个更大的系统内体现其存在的合理性。即：(1)在阴阳系统中，中国古人尊左卑右；(2)在权力系统中，中国古人尊右卑左；(3)从太阳崇拜出发，中国古人尊东卑西；(4)从神秘崇拜出发，中国古人尊西卑东。如果出于(1)(2)双重视点，则左右皆尊；如果出于(3)(4)双重视点，则东西皆贵。由于左右的方位确定随主体的视点移动而变化；东西的方位确定不随主体视点的移动而变化，因此，当主体面南或面北的时候，尊左或尊右的内涵是不同的。又由于尊左和尊右的背后，有着不同的观念支撑，因此，当不同的观念作用于人们的方位意识时，便可能引发出崇左尚右和尊东贵西文化关联的复杂对应——这里体现的，是中国古人变绝对事物为相对状态的大智慧。

[附录 1] 广义修辞学：序与自序 / 264

《小说辞章学》序 / 264

《理论修辞学》序 / 266

《空灵叙事：汪曾祺创作论》序 / 269

《中国修辞学研究转型论纲》序 / 271

《人与人的对话》前言 / 275

《广义修辞学》自序 / 277

《修辞：审美与文化》自序 / 281

《修辞研究：走出技巧论》自序 / 284

《修辞认知和语用环境》自序 / 291

《修辞学大视野》序 / 293

[附录 2] 《光明日报》所刊一组阅读札记 / 300

坐——在场姿态和生存寓言 / 300

把握欲望的临界 / 302

民以食为天 / 305

人不能证明自己 / 308

中国学术研究:呼唤学派意识 / 311

学术期刊:学术话语的集散地 / 313

汉字规范和文化阻力 / 315

“弃子逐臣”:一个结构性隐喻 / 319

历史与修辞相遇 / 321

学术传播和话语权 / 323

[附录3] 作者部分学术著作和系列论文目录 / 326

上篇

文学语言、文学现象、文学史的
广义修辞学阐释

再思考：语言转向背景下的 中国文学语言研究

哲学进入“分析时代”，意味着一个新的学术话语场的建构：从“认识如何可能”转向“语言表达如何可能”。这一转向过程，伴随着语言工具性向本体性的提升。表述这一学术事件的关键词“linguistic turn”，以“语言转向”、“语言学转向”、“语言论转向”、“语言性转向”等不同译法，见于各类学术文本。从语义说，“语言性转向”的译法更确切；从语用频率说，“语言转向”使用更广泛。本文在术语的使用上从众。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发生的语言转向，影响所至，广泛涉及哲学、逻辑学、语用学、历史学和文学，80 年代中后期对中国文学从理论到创作产生了一股不小的冲击波。作为对 20 世纪中国文学状态的一种调整，语言转向在一定程度上重建了文学语言研究格局。它在中国文化语境中有些晚到的“语言热”中启动，后续的研究势头时强时弱，但一直没有止息。经过 20 年的理论沉淀和实践操作，重返当年的学术背景，对语言转向拉动的文学语言研究进行再思考，既有利于清醒地审视过去，也利于在再出发的进程中找准自己的位置。

一、语言转向给文学语言研究带来了什么

至少可以从四个方面总结语言转向对近 20 年文学语言研究、

文学和语言：广义修辞学的学术空间

进而对整个中国文学研究产生的影响。

1. 标题话语变换：文学语言研究学术走向的调整

考察文学语言研究在某种理论转向时期的变化，标题话语是一个独特的观察点。

学术论文通过标题话语被命名。作为理论文章学术看点的凝炼展示，标题话语体现了某种学术走向，预示了话语展开的方向，预留了话语空间。正像新闻写作有“标题即新闻”的说法，学术论文写作也存在“标题即叙事”、“标题即论述”的问题。我对《文艺研究》创刊第一个10年（1981—1990）的全部论文目录做了统计，该刊在这一时间段发表文学语言研究论文43篇，见下表：

时间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篇数	1	1	3	2	2	15	6	5	5	3

选择《文艺研究》为抽样分析对象，是因为我认为这份刊物在语言转向背景下推动国内的文学语言研究方面具有较强的影响力。^[1]选择10年的标题话语为分析对象，有三个原因：一是节约篇幅；二是减少重复。在后文的分析中，我还将涉及1991年以来在《文艺研究》发表的同类研究成果；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以10年为一个时间单位，便于比较：1985年大体上是语言转向的一个过渡期，或者可以看作此后“语言热”的一个准备期。80年代中期文学的主体性研究留下的缺口，正好为转向文学的语言研究打开了空间。1985年是一个界碑，据此，我倾向于把1985年前后的文学语言研究文章，分别置入语言转向前后的理论背景。

1984年前，从艺术理论和文体角度讨论文学语言的文章分别为3篇：

《试论幽默的情境和功能》（陈孝英，1981）